



## 张志伟 中国哲学还是中国思想？

2006年10月18日

来源:论坛主题

### 作者其他文章

栏目广告6, 生成文件 HTDOCS/NEWXX9.HTM 备用,

[内容提要] 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学术始终面临着合法性危机。上个世纪初,留洋的中国学者以胡适和冯友兰为代表,按照西方哲学的概念系统梳理中国的文献典籍,形成了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然而,中国哲学却不断地遭遇究竟是不是哲学的难题。本文认为,哲学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就狭义的哲学而论,西方哲学是哲学,中国哲学则不是哲学。但就广义的哲学而论,中国哲学、印度哲学和西方哲学都可以称之为哲学。不过,我们不妨以“思想”概念来取代广义的哲学概念,认西方思想为采取哲学思路的特殊方式,于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中国思想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方式?然而真正关键的问题乃在于中国哲学是否具有应对当今时代之现实问题的潜力。

[关键词] 哲学;思想;中国哲学;合法性。

张志伟,1956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西方哲学。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中国哲学”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中国古典哲学,亦即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一是指中国古典哲学在现代的传承和发展,即中国现代哲学。本文在多数情况下对这两方面的含义并没有作严格的区分,因为它们都关涉同一个问题:中国哲学究竟是“哲学在中国”,还是“中国的哲学”。严格说来,中国哲学被称之为中国哲学,始于上个世纪初,以胡适为首的一些留洋中国学者按照西方哲学的概念系统,梳理中国古代文献典籍的工作,迄今不过百年。在中国研究中国哲学,自始就面临着合法性的危机。

通常我们把世界上的哲学划分为三大形态: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然而,把中国哲学归属于哲学的名下,历来存在着不同意见。往前说有黑格尔,最近则有德里达。黑格尔的观点众所周知,他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哲学从希腊开始,由于东方人的精神还沉浸在实体之中,尚未获得个体性,因而还没有达到精神的自觉或自我意识。所以,所谓中国哲学还不是哲学,不过是一些道德说教而已。黑格尔甚至说:“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无独有偶,2001年9月访法的法国著名哲学家德里达亦认为中国哲学不是哲学而是一种思想,不过他并不没有像黑格尔那样贬低中国哲学,而是主张哲学作为西方文明的传统,乃是源出于古希腊的东西,而中国文化则是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外的一种文明。有意思的是,当时在场的王元化先生同样举孔子为例,称《论语》只是道德箴言。当然,考虑到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当德里达说中国没有哲学的时候,即使不是赞扬,至少不包含贬义。

然而无论如何,黑格尔和德里达都认为中国没有哲学。那么,中国哲学究竟是不是哲学?中国哲学是哲学还是思想?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名词概念使用的合法性问题,它关系到研究中国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乃至合法性和可能性等一系列的问题。研究中国哲学的中国学者之所以困扰于这样的难题,是因为现在全球的学科分类、概念系统和知识架构所依照的都是西方的标准。西方人按照西方的标准看待中国思想,中国人也只好按照西方的标准理解和梳理自己的传统。本来,说中国没有哲学,就如同说西方没有儒家、道教和四大发明一样,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问题是,目前全世界踏上的现代化、全球化的道路,是西方人开拓的,而且评价标准也是由西方人定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说中国没有哲学,那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一种侮辱,这意味着中国古老文明无论多么灿烂辉煌,毕竟没有达到比较高的理论思维水平。显然,遭遇这样的问题,我们很难心平气和地当它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

但是,除非我们能够证明“中国究竟有没有哲学”根本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否则就应

该以学术的态度对待之。

我的研究方向是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知之甚少，本来不便乱发议论。但是作为中国人研究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便有惺惺相惜，唇亡齿寒之深切感受。所以希望从西方哲学的角度，对中国哲学的定位问题说一说我的看法。

## 一

“中国有没有哲学”或者“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的问题，首先需要确定的是“哲学”的定义。然而，在“什么是哲学”的问题上，哲学家们从来就没有达到过普遍一致的共识，所以从哲学的定义出发来厘定中国哲学的意义，并不是一个好办法。从不同的定义出发，可以有不同的结果。不过，哲学毕竟存在了2000多年，一致的对象和笼统的规定还是有的。我倾向于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规定哲学：就广义的哲学而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和印度哲学以及其他文明的哲学都是哲学。但若从狭义上理解，哲学就是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的确不是哲学。相对于狭义的哲学，我们可以将广义的哲学称为“思想”。就此而论，世界上所有文明最高的意识形态都是“思想”，西方思想则是“哲学”。这就是说，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和西方文明都有“思想”，只是西方思想采取了“哲学”的形式，因而被称之为“哲学”。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就哲学所研究的对象和问题而论，中国哲学当然是哲学。但就哲学作为一个学科而论，中国哲学则不是哲学。

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哲学”（philosophy）概念是一个外来语，来自日文对英语的翻译。严格意义上的哲学是希腊人的创造，经过近代的发展，逐渐成为一门学科。在学科化的过程中，西方哲学形成了特有的概念系统和方法论体系，而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之所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简言之，我们可以笼统地将西方哲学看作是一种科学思维方式，它通过理性认识把握自然万物的本质和规律，以公理化系统为基本模式，以“是什么”为问题，试图以层层抽象追问最高的普遍性的方式，获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举例说，我们可以从许多枝玫瑰花中抽象出“玫瑰花”的属性，从各种各样的花中抽象出“花”的属性，再从花草树木中抽象出“植物”的属性……。按照这个思路如此类推，我们最终将抽象到最高的普遍性——“存在”，形而上学或者本体论就是追问“存在”是什么的学问。所有存在着的事物都必须以存在为其存在的前提，同理，所有研究存在着的事物的科学都必须以哲学为基础。近代哲学的创始人笛卡尔曾经将人类所有的知识比喻为一棵大树，形而上学是根，物理学（自然哲学）是干，其他科学则是枝叶和果实。在哲学家的心目中，哲学尤其是形而上学在人类知识中的崇高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当然，这样一般地规定西方哲学难免失之偏颇，不得已而为之。

我们之所以一般地称西方哲学为科学思维方式，是因为西方哲学乃是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研究哲学问题的典型。由于近代以来，这种思维方式在自然科学的领域结出了硕果，以至于使哲学亦义无反顾地踏上了科学的道路。虽然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家们意识到了问题之所在，所以对形而上学科学思维方式展开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激烈批判，其中亦不乏矫枉过正的举动。但是，大规模批判形而上学的活动，迄今为止也不过百年。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2000多年来，科学思维方式已经渗透到了西方文明的血液里，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一言以蔽之，就狭义哲学而论，判断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可以视这种科学思维方式为标准，实际上也就是以西方哲学为标准。在西方哲学的名下有一系列“部门”或者“分支”，例如本体论（形而上学）、认识论、逻辑学……等等，它们之间界限分明，都有规范的概念、方法和理论系统，自成一学科，而中国哲学虽然不能说没有讨论过相应的问题，但的确没有这样明晰的学科规定，也相应地没有学科性的发展。例如西方哲学尤其近代哲学以来，认识论得到了广泛深入的发展，对于认识对象和认识主体以及相应的问题进行了越来越精细的讨论。中国哲学虽然也有认识论的问题，但却没有认识论——关于认识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当我们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衡量中国哲学的时候，肯定会发现中国哲学不符合西方哲学的规范。黑格尔说中国没有哲学，与德里达说中国没有哲学，虽然立场和态度正好相反，但却是基于同一个根据：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换言之，两者都是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衡量中国哲学究竟是不是哲学的。显然，如果站在西方哲学的立场看，中国哲学的确不是哲学。

然而，如果从广义的哲学即“思想”的角度看，中国哲学则是哲学，我们不妨称之为“中国思想”。

那么，什么是思想？

## 二

如果就哲学问题而论，不能说中国哲学不是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证明，通过科学思维方式是不可能解决哲学问题的，故而中国哲学的思路便成了一种选择，虽然这一选择也不会是唯一的选择。西方有些哲学家如海德格尔借鉴东方思想包括中国的道家思想，就是一例。

我个人主张，哲学是广义的人生哲学，因为哲学产生于人类精神试图超越自身的有限性通达自由境界的至高无上的理想，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终极关怀”的问题。当然，像美学（文学艺术）、宗教和哲学都是

人类精神终极关怀的不同体现。所以仅就终极关怀之问题而论，还不能确定中国哲学是或者不是哲学。中国思想的特殊性在于，如果从西方人的角度看，很难区分它究竟属于哪个学科领域。我们经常说，在中国思想中，不仅文史哲不分家，而且在某些学者看来亦具有宗教的性质，例如称儒家思想为“儒教”，实难以西方划分学科的方式梳理清楚，一旦梳理清楚了，恐怕就不再是中国思想了。

所以，将中国哲学称之为“中国思想”，一样需要说明理由。

从概念上说，与“哲学”相比，“思想”不仅太过笼统，而且也面临着高低深浅的质疑。我们可以把许多东西归入“思想”之中：感觉经验、理论思维、实践理性、宗教体验、审美感受……。“思想”如同一个大口袋，什么东西都可以装进去。另外，一说到“思想史”，按照通常的理解，就是文化变迁、社会思潮或政治思想的历史。于是，人们可能心存疑虑，如果中国哲学不叫中国哲学而叫中国思想，是不是变相地降低了中国哲学的身份和地位？这与说中国没有哲学有什么两样？就此而论，我们有必要把“思想”的含义说清楚。当然，就“思想”的概念含义而论，恐怕像哲学一样是说不清楚的，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围绕“思想”的身份和地位进行一番讨论。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当我们在此使用“思想”这个概念的时候，既不是从认识论上规定的，也不是从意识形态的结构上说的，亦与社会思潮和政治思想无关，而是一般地意指某一种文化的精神性的神韵和精髓。简言之，中国文明、西方文明乃至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文明，其精神文明中的最高成就，作为文明的灵魂的东西，就是“思想”。显然，“思想”可以是许多“学科”的研究对象：文化、文学、历史、宗教，其中也有哲学。不过，“思想”亦比所有的“学科”更古老、深邃和源始。为什么最是标榜创新和发展的西方哲学，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要回到古希腊去汲取营养？因为“思想”是“哲学”的活水源头。

那么，在哲学与思想之间作这一重区分，有什么意义？

在不同的文化、社会、历史等背景之下，人类精神在追问终极关怀之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特有的思维方式或世界观，这种思维方式或世界观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方式。西方哲学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或世界观，主要表现为科学思维方式。自近代以来，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这种科学思维方式极大地促进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并且将科学的精神和方法贯彻于自然、社会和人类精神的所有领域，将整个世界上带上了现代化的路径。不过，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思想家们开始反思科学思维方式的局限性。人们逐渐意识到，哲学作为科学思维方式虽然在对自然的认识等方面产生了非凡的成就，但是亦有其自身的限度。它在对于自然“祛魅”的过程中亦使精神的领域科学化了，而面对终极关怀的问题则越来越显得无能为力。在某种意义上说，思想的哲学化或许正是西方哲学面临之种种问题的根源之一。哲学作为思想的一种表现形式，自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但如果我们将思想等同于哲学，势必使丰富多彩、奥妙无穷的精神世界在抽象化的过程中失去它的内在生命。我们可以把“思想”看作是活生生的、具有本源性的、构成性的源始境域，“哲学”则是学科化、规范化和程式化的“科学”。思想是“根”，哲学则是由此“根”而生出的“树干”之一。如果哲学能够从思想之源中汲取养分，那么就可以茁壮成长。而当哲学遗忘了它的根时，它便丧失了生命的活力。

譬如中国思想史与中国哲学史的区别。

将中国思想史与中国哲学史分开，本无可厚非。但是，由于中国哲学史是按照西方哲学的形式从中国思想史中梳理出来的，所以问题多多。而在此基础上我们又常常按照西方哲学的方式将中国哲学史凌驾于中国思想史之上，于是问题就更多了。单就中国哲学而论，不仅将中国思想史与中国哲学史泾渭分明地分而治之是成问题的，而且应该确立思想史对于哲学史的本源地位。

以上关于“思想”与“哲学”所说的，基本上关乎“思想”与“哲学”的差别。如果我们将“思想”看作是广义的哲学，则需要另有说明。我想以海德格尔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海德格尔有一篇文章叫做《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他所说的“哲学”指的是建立在科学思维方式基础上的西方哲学，而“思”则意指对真正本源的源始境域的思想。在此，“源始”不是“原始”，并非时间意义上的古老，而是根本、根据的意思。按照海德格尔，西方哲学锻造的科学思维方式或许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活动中创造了非凡的成就，但其严重后果是，人被连根拔起，成了无家可归的浪子。因此，他主张返归主客尚未分化的源始境域，提倡一种本源之思。如果说西方古典哲学的基本思路是“向上”抽象，那么可以说海德格尔的思路则是“向下”回溯的。其实，西方哲学史上像海德格尔这样质疑哲学的哲学家不乏其人，例如康德。显然，我们不可能把康德和海德格尔排除在哲学之外，不仅不能排除在哲学之外，而且还视之为哲学家中的哲学家。由此可见，把西方哲学规定为一种科学思维方式，主要是从一般意义上说的。另一方面，主张非科学思维方式的思想家如海德格尔亦是伟大的哲学家，哲学因此可作广义狭义之理解。

那么，我们从什么意义上将“思想”视为广义的哲学呢？如前所述，哲学产生于人类精神试图超越自身有限性通达至高无上的自由境界的理想，广义而论，这更应该看作是思想的起源。换言之，思想起源于终极关怀问题，哲学则是其中对此问题的一种回应方式。“思想”这个概念虽然笼统，但是当我们通过“思想”来体现文明的神韵和精髓，并且视之为广义的哲学的时候，就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东西都可以称之为“思想”的了。“思想”既是一种认识能力，也是思维的结果，更可以看作是思想的对象。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思想去思想思想的对象，也就是思想的反思，而反思则带有自我意识的性质。虽然人类文明创



造了许许多多光辉灿烂的伟大成就，然而只有当它能够反思自己的成就，达到思想的自觉的时候，才能说达到了比较高的境界。中国有句成语道：“殊途同归”。西方的谚语则是：“条条道路通罗马”。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一样都是以某种至高无上的思想境界为追求的目标，只是所走的道路有所不同罢了。如果可以将思想看作是广义的哲学，那么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就是两种不同的哲学道路，这两条道路殊途同归，目的是一个，那就是人类的精神家园。

当然，尽管“同归”，毕竟“殊途”。从广义上将中国思想看作是哲学，的确需要说明。

文史哲不分虽然是中国哲学的特点，但并非中国哲学所独有，在希腊哲学中就是哲学与科学不分的，甚至许多思想包含有宗教的成分。人类思想初创之时，所有的成分原本熔为一炉，学科划分乃是后来的事情。中国思想的最高境界，可以用张载的话作总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都是哲学的观念。尽管在中国思想中文史哲不分，但是思想家们对“天”、“道”、“理”、“气”、“心”等等概念范畴的思考，既不是文学的虚构，不是历史的记载，也不是宗教的教条，而是思想的探索。他们探索的领域，属于世界观和人生观，无论是外在的超越还是内在的超越，总之具有超越的性质。

如前所述，世界各大文明都有自己的“精神”和“灵魂”，我们可以从广义上把它们看作是哲学的对象，不过最好称之为“思想”。西方人锻造了一种科学思维方式，走上了哲学的道路，这是西方思想的特点。由于关于终极关怀的哲学问题是人类精神永远在追问但却不可能有终极答案的难题，所以没有哪一种解决的方式可以终结人类精神的探索。因而，西方思想采取了科学思维方式，那只是其解决哲学问题的特殊思路，并不是唯一的思路。既然西方思想不是解决哲学问题的唯一思路，探讨这些哲学问题的中国思想就有其自身的生存空间和存在的意义，而且构成了西方哲学之外的另一种选择。所以从广义上说，中国哲学当然也是哲学。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西方哲学一定属于思想，但思想不一定非要采取西方哲学的形式，它完全可能走另一条路，例如中国哲学之路。

其实，讨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哲学或者思想的概念含义，主要还在于中国哲学或者中国思想究竟有没有能力应对现时代的问题。换言之，关键在于中国哲学的内在生命力。

### 三

中国哲学经过百年来的学科研究，现在走到了十字路口。讨论中国哲学的出路，这个题目太大了，不是本文承担得了的，加之专业的限制，恐怕难免有隔靴搔痒之嫌，我只想借此题目说一些不成熟的想法。

如前所引，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曾经提出了“中国哲学”与“哲学在中国”的区别。讲中国数学史，其实是“数学在中国”，因为数学不分中国数学和西方数学，数学就是数学。但是讲到哲学，却有一个究竟是“中国哲学”还是“哲学在中国”的区别。显然，哲学不同于数学，不分中外东西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中国哲学不是哲学在中国的表现，中国哲学虽然与西方哲学都属于哲学的名下，却是两种不同的哲学。换言之，中国哲学作为中国哲学有其自身特有的特征。由此可见，如果简单地按照西方哲学的概念系统梳理中国思想，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中国哲学究竟是不是哲学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妨将中国哲学称之为“中国思想”：哲学一定属于思想，但思想却不必一定采取哲学的形式。不过，中国哲学究竟应该叫做中国哲学还是中国思想，还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关键是，中国哲学究竟有没有能力对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做出自己的回应？这也就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哲学就没有出路。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具有极其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政治、思想等背景，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几可看作在中西文化的冲撞与融合之中，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之中，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所遭遇之难题的一个缩影。鉴于问题的复杂性，我想把问题限制在学科问题上，简单讨论三个问题：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和哲学史观。

首先，中国哲学研究方法问题。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与按照西方哲学的概念、方法和理论框架梳理中国古典文献典籍，并且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衡量中国思想的学术活动，密切相关。尽管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系研究中国哲学无可厚非，在今天看来也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不顾中国哲学的特殊性，强制性地将其纳入西方哲学的框架系统，不只会产生合法性危机的问题，而且使中国哲学丧失了作为中国哲学的精髓和神韵，这几乎已经成了人们的共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既不可能按照中国哲学传统的思路走下去，也不能继续按照西方哲学的方式研究中国哲学，我们应该怎么做？由于专业的限制，我不可能给出具体的方法，只想就一些原则问题说一说我的看法。

如果以“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代表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那么可以说以往的学术界比较倾向于“我注六经”，而上个世纪80年代作为高扬主体性的时代，有人则更倾向于“六经注我”，现在看来，这种倾向难免矫枉过正之嫌。我以为，我们可以以哲学解释学为基础，通过视界交融的方式，在中国古典哲学与现代哲学之间建立一种积极的对话关系。不过为了防止过度的相对主义，亦即不同的视界交融产生的不同成果之间难以通约，需要采取“还原”的方法作为补充，亦即确定原初本源的境域作为“视界交融”的基础和前提。古人的学说乃是在特定的环境下阐发的，我们也以孔子《论语》为例。《论语》作为孔子与其

门徒对话的集锦，体现了孔子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他很少用大而化之的普遍理论教育学生，而是在不同的境域中针对不同的对象，以不同的方式阐发其丰富深邃的思想。如果我们不能将孔子的语录还原到原初的语境中来理解，而是将其独立出来，还要追问其普遍的含义，当然不可能体会其活生生的思想意蕴。这是就某位哲学家而说的。若就更加广阔的思想环境而论，我们亦有必要采取还原的策略。当我们面对热闹非凡的20世纪哲学，冷眼观之，一定会生出一番感慨：不知50年100年后，还有几位哲学家名留青史？显然，50年后100年后我们所看到的“缩水”后的20世纪哲学史，可能只剩下了几位“代表”。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想了解那个时代，了解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哲学思想，仅仅关注这几位代表的思想是远远不够的，至少需要再现那个时代的整体的理智氛围。当我们过分关注思想与思想之间的传承与发展的时候，往往有意无意地将哲学思想的历史强制性地纳入了逻辑之中，殊不知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往往是后人完全凭逻辑推演出来的，不一定符合历史的事实。因此，为了避免以逻辑代替真实的历史，我们有必要尽量“复原”当时的历史环境，确定一种哲学思想在当时的恰当的历史地位，从而使被逻辑简化了的历史丰富起来。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来说，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以西方哲学的概念、方法和理论框架疏理中国哲学的历史，实际上就具有逻辑地简化历史的危险。

当然，我们发现了以西方哲学的概念、丰富和理论框架疏理中国哲学的问题所在，但是我们是否有必要彻底抛开西方哲学而另辟蹊径，回到一百多年前甚至更久远的过去，完全按照中国传统的注经解典的方式研究中国哲学？我们以为，这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中国思想需要汲取外来的文化其中包括西方文化，取长补短，焕发青春，闭关自守，固步自封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且无论大环境还是小环境，都早已渗透了西方思想的影响。另外，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思想的确缺少西方哲学的思辨性和清晰性。所以，今后的中国哲学研究将面临的重大难题，可能就是如何纠正原样照搬西方哲学研究中国思想的不良后果，借鉴西方哲学之所长，同时不至于丧失中国思想的精髓与神韵。

其次，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中国哲学之“重生”的关键并不在于它究竟是哲学还是思想，而在于其自身的现代性转化的问题。所以，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表面上是一个学科性的问题，而实质上则是现代化的问题，这是探讨中国哲学绕不过去的问题。

中国哲学或者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一向是学界思考的重要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断层”的危机，换言之，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一方面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白话文取代言文而成为学术语言，传统的文献典籍束之高阁，研究者日益渐少。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化的需要与西方文化的传播，中国学术基本上已经“西化”了，现在中国人从小到大受的教育基本上是西方式的教育，甚至汉语的语法也是根据西方语言的语法框架整理出来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现代化不是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甚至是通过反传统文化的方式实现的。中国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应该是其中核心的组成部分。如此说来，中国哲学要想走出困境，首先就必须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那么，如何解决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

简言之，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不能理解为“西化”，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科学化。中国哲学百年来最主要的经验教训，就是现代化不等于西化。我以为，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原因、目的和标准，集中于一点，就是看它是否能够积极地、建设性地并且有其独到之处地回应现时代的现实问题。在当今世界全面展开了现代化全球化之际，我们有必要明确一个基本原则：全球化并不是要全世界所有的文明“化”为一种文明，恰恰相反，它不过是各式各样的文明相互之间展开交流融合提供的一个大平台。

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其一美其名曰“返璞归真”，回溯到中国哲学的本源，去寻找治疗现代文化之疾病的灵丹妙药。其二为各取所需，为我所用，用传统文化中与现代文明具有一定亲和性的东西弥补其缺陷。其三则是解释学的方式：关注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视界交融”，所谓创造性的转化。我以为，这第三种方式比较合理。在现代化乃至全球化遍及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今天，文化保守主义显然是不可行的。因为有科技社会的异化现象，就要求退回到被理想化了的过去，那是因噎废食，既于理不通，亦难产生现实意义。看到现代文明缺少什么，就从传统文化中找出点儿补丁缝缝补补，更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解决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首先需要确定或者确立现代文化所植根的土壤或者根基，也就是所谓一种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这是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进程所获得的最宝贵的经验教训。中国文明植根于自身的传统文化土壤之中，中国的现代化当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因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证明中国哲学对于解决现代文明之难题所具有的意义。如果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只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毫无现实意义，那不过是将中国哲学当作死古董来研究，也用不着讨论合法性的问题了。

我们可能会问，一种古典哲学如何对现代文化的难题具有现实意义？且不论中国的传统文化构成了中国现代文明的“底色”，中国文明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完全彻底西化，因而中国哲学作为传统文化的精华亦应该成为中国现代文明的灵魂。实际上任何时代的哲学都不仅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为此，我们需要重新调整我们的哲学史观。

第三，重新审视我们的哲学史观。我们的哲学史观长期以来受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想的束缚，惯于以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盖棺论定，似乎这就是我们研究哲学史的目的。另一方面，则是深受黑格尔的哲学史观的影响，把哲学史看作一种哲学自身发展演变的线性进化过程，似乎越是后来的哲学一定

比在先的哲学更接近真理。这种哲学史观的负面影响，决不亚于以西方哲学的概念、方法和理论框架疏理中国哲学所产生的后果。就此而论，我想引入一种与黑格尔的哲学史观不同的哲学史观。

哲学——无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就其起源于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而论，它的问题域具有无限的开放性的特点，因而不存在终极的答案，只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解答方式。一种哲学思想，例如孔子的学说，之所以具有现实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我们面对同样的哲学问题而可以采取的一种选择。从这个角度看，哲学思想无论多么古老，都同时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的双重意义，甚至可以说其现实性恰恰体现在历史之中。这就是说，如何思想都不会因为成为历史而过时。在某种意义上说，当我们研究古典哲学的时候，古人的思想就在我们的思想中“复活”了，而这种“复活”并非简单地“复古”。由于我们与古人面对的是同样或者类似的哲学问题，他们的思想就成了我们的哲学思考的必经之路，由此出发我们才能选择和开拓新的道路。因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寻找和确定中国哲学面对的哲学问题与我们所面对的哲学问题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将有史以来所有的哲学思想都纳入我们的选择范围之中。这样一来，我们才能辨别清楚中国哲学中的“死东西”和“活东西”，重新塑造中华文明的灵魂。

总而言之，就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问题而论，我们不仅需要重新审视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也需要重新审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的复杂关系。虽然问题十分复杂，但我们也不是没有有利条件：我们同时面对中国思想和西方哲学各式各样的学说思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更加广泛的选择余地。当然，难题也就在这里了：在没有路的世界作开路先锋是异常艰难的，但路如果太多了也会使我们无所适从。

海德格尔在一次与一位日本学者对话时，对日本学者试图求助于欧洲美学思想来找到一些必要的概念把握日本的艺术，表示不以为然，他并不认为缺少规范和确定性是东方语言的缺陷。海德格尔担忧引入欧洲美学概念的结果是：“东亚艺术的真正本质被掩盖起来了。而且被贩卖到一个与它格格不入的领域中去了”。虽然海德格尔谈的是艺术，但是考虑到他试图以诗化思想取代哲学的科学思维方式，可以说讨论的也是哲学。如其所说，语言是存在的家。西方人有西方人的家，我们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家。不论哪一种声音都在应和天籁，但毕竟属于不同的声音。我以为，在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有太多的不可通约之处，强使中国哲学发出西方哲学的声音，或者迫使西方哲学说中国哲学的话，都是不可能的。然而，尽管不同的哲学之间不可通约，但是彼此相互之间的交流而且由此交流产生创造性的成果，却是完全可能的，对于中国哲学的传承与发展而言，亦是十分必要的。

最后我想再做一点说明。如前所述，“中国哲学”应该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作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的中国传统哲学，即中国古典哲学；一是中国传统哲学在当代的传承、延续和发展，即中国现代哲学。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问题，当然首先是就中国传统哲学而言的，但并非与中国现代哲学没有关系。如果说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应该吸取百年来的经验教训，尽量恢复中国哲学的本来面目，再现其源始的原生态，那么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哲学研究要解决的问题则是如何在前者的基础上，融汇人类所有的精神文明，开创崭新的未来。就此而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目标应该是成就中国（现代）哲学，其实这也就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中国哲学不是我的专业，因而以上所说，肯定有许多不当之处，希望方家不吝赐教。

（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文章添加：[消失的火](#) 最后编辑：

点击数:1339 本周点击数:1 [打印本页](#) [推荐给好友](#) [站内收藏](#) [联系管理员](#)

相关评论（只显示最新5条）

zhongda 于2006-10-24 17:10:14

这个问题绝对取决于哲学的定义，就如同考察我考了65是不是及格的问题，首先要定义及格，如果定义为60分为及格，按就是我及格了，如果定义为65为及格线，那就不及格。就这么简单。

关于中国古代的思想是不是哲学，按照西方的经典定义，不能算是哲学，这是显而易见的。

